



87
1

(总第8期)

Qing yuan

zong heng
8

庆元纵横

政协庆元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庆元纵横

第一期（总第八期）
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目 录

故土情	县党史办公室	4
光明的抉择	刘先标	8
回忆我在庆元的日子	吴醒耶	14
民先队在庆元	姚嗣崇、吴引年	22
儿童不忘报国心	吴朝仪	24
经济纪实		
他在闯一条新路	云石 增飞	34
改良毛边纸见闻	朱上智	35
解放前县城中药店知多少	秩 群	36
蒙州旧事		
修建关隘记	史澄章	38
万夫莫向话古隘	何 须	40
	克 冲	42
教育今昔		
松源书院和对峰书院	吴文山	44
实行“三实一联”办好职业教育	胡睦选	46
竹坪小学简介	姚 远	49
课堂里的新客人		
香菇之乡		
谈谈我县香菇生产及经营	庆 云	51
食用菌的利用和加工	吴志旭	53
庆元县香菇生产供销公司	吴式远	55
人物春秋		
不趋势利 以古自期	赖善卿	57

风云录	青山在他胸中	祥焕 思辛	59
	她倾注的是全心的爱	夏富才	62
文化鳞爪	庆元戏剧简史	姚德安	64
	试谈庆元民间谜语	林 峰	67
地方名产	茯 苓	吴金灿	89
文物胜迹	八角殿	望 耕	70
庆元风俗	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林 泉	71
大事记	李德葆副省长来我县视察		72
	政协召开“振兴经济讨论会”		73
	施平等老同志看望老区人民		74
乡镇介绍	“书乡”——竹坪乡	里 民 胡永祯	78
庆元赞		王昭胜	80
题烈士墓	毛留荣、胡儒溪、吴兴荣		81
	信的风波	韦伟光	82
艺海拾贝	左溪散记	宝兴等	83
	胡纮献方竹巧鞭昏皇	彭荣根	85
	猿龟怨	胡睦煦	87

发行：政协庆元县文史办公室
 (地址：庆元县府大院内。电话：四七九)
 编辑：《庆元纵横》编辑部

主编：余 绪
 本期编辑：赖善卿
 刘成本
 王西金
 封面设计：刘成本
 印刷：松溪县印刷厂

纵贯古今 横及各方

——代《庆元文史》改刊词

练华芳

《庆元文史》创刊至今已发行七期，编辑出版了本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约五十万字的历史资料。这些史料的出版，有助于大家进一步了解庆元的昨天与今天，更好地认识庆元，建设庆元，因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为更好地发挥本刊的作用，根据读者的意见和要求，结合我县实际，鉴于《庆元文史》既有历史资料，又有现实报道，越过了历史范畴而成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性刊物。为此，决定自本期起将《庆元文史》改名为《庆元纵横》。《庆元纵横》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继续征集文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将我县史料工作逐步向专题化与系统化方向发展。在此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报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闻，介绍市场经济、技术信息，致力为改革、开放、发展我县商品经济服务。希望广大读者与本刊通讯员经常指教，积极来稿，让《庆元纵横》为振兴庆元作出新贡献。

庆元纵横

第一期（总第八期）
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目 录

故土情	县党史办公室	4
光明的抉择	刘先标	8
回忆我在庆元的日子	吴醒耶	14
民先队在庆元	姚嗣崇、吴引年	22
儿童不忘报国心	吴朝仪	24
经济纪实		
他在闯一条新路	云石 增飞	34
改良毛边纸见闻	朱上智	35
解放前县城中药店知多少	秩 群	36
蒙州旧事		
修建关隘记	史澄章	38
万夫莫同话古隘	何 须	40
松源书院和对峰书院	克 冲	42
教育今昔		
实行“三实一联”办好职业教育	吴文山	44
竹坪小学简介	胡睦选	46
课堂里的新客人	姚 远	49
香菇之乡		
谈谈我县香菇生产及经营	庆 云	51
食用菌的利用和加工	吴志旭	53
庆元县香菇生产供销公司	吴式远	55
人物春秋		
不趋势利 以古自期	赖善卿	57

风云录	青山在他胸中	祥焕 思辛	59
	她倾注的是全心的爱	夏富才	62
文化鳞爪	庆元戏剧简史	姚德安	64
	试谈庆元民间谜语	林 峰	67
地方名产	茯 苓	吴金灿	89
文物胜迹	八角殿	望 耕	70
庆元风俗	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林 泉	71
大事记	李德葆副省长来我县视察		72
	政协召开“振兴经济讨论会”		73
	施平等老同志看望老区人民		74
乡镇介绍	“书乡”——竹坪乡	里 民 胡永祯	78
庆元赞		王昭胜	80
题烈士墓	毛留荣、胡儒溪、吴兴荣		81
	信的风波	韦伟光	82
艺海拾贝	左溪散记	宝兴等	83
	胡纮献方竹巧鞭昏皇	彭荣根	85
	猿龟怨	胡睦煦	87

发行：政协庆元县文史办公室
 (地址：庆元县府大院内。电话：四七九)
 编辑：《庆元纵横》编辑部

主编：余 绪
 本期编辑：赖善卿
 刘成本
 王西金
 封面设计：刘成本
 印刷：松溪县印刷厂

故 土 情

——施平等老同志回访随记

县委党史办公室

1986年10月4日上午。

几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同志，在晨曦下健步登上石龙山，向烈士纪念碑献了花圈，又深深地三鞠躬，以幸存者身份，表达对战争年月牺牲在庆元的战友的怀念和敬意。在丹心亭里，居高临下，目览松源全城，故土新貌，激起了老同志的无限感慨。他们在辨认当年小城残迹，夸赞解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情不自禁地说：“变了，完全变了，与四十八年前相比，根本认不出来了。”

这些老同志，就是原浙南工委委员，1938年的中共庆元县委书记，刚卸任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施平、原浙南工委书记，解放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粟、原浙南工委委员，现任国防科委局长陈平和夫人、原中共浙江省委妇女委员杜永康、原国民党浙江省建设厅科长，负责地下党联络工作的现上海市计经委副主任廖卜三和夫人邵亚仁。他们一行是应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邀请，前来参加中共浙南工作委员会党史座谈会时，不顾年高，不辞辛苦，千里迢迢专程来到庆元访问的。

下了石龙山，走经修葺一新的咏归桥，几位老同志踱步桥上，雕梁画栋，独具山城特色的古建筑，引进了回忆的遐想。是啊，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这里曾是地下党活动的场所，那些为着民族解放而不惜牺牲的革命志士，当年就是利用散步、聊天作掩护，三三两两地在哪儿进行秘密活动的。

在弦歌坊，施平同志指着正在施工的一座大楼向随同人员介绍，这是当年县合作金库的旧址。最早在这个合作金库担任经理的周国俊，是我党最早派来的地下党员、是他向省委汇报后，省委才派施

平等人来组建庆元县党的特别支部和县委。因此，周国俊同志应是庆元地下党的先驱者。

在府后街，施老还依稀辨认出姚文林先生的住处，姚老先生是位名绅，他思想进步，倾向抗日，不仅在这条街上妇幼皆知，就是在全县也是深孚众望。地下党过去曾利用他在上层社会的关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有时地下党县委，在姚老先生楼上开会，姚老先生即在楼下会见国民党县长。这种“白皮红心”，对革命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儿子姚玄、孙姚嗣崇都参加了共产党，今天，当年逾古稀的姚嗣崇同志陪伴他们一起游览故地并共同回想起过去那斗争年月的时候，两位老人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在县机关食堂门口，施老告诉大家，这是当年国民党县长罗中天的办公处，他曾在这里多次开会。抗日战争初期，桂系军阀黄绍竑在山西与我党有过接触，受我党抗日宣传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战略决策的影响较深。蒋介石调他来浙江省当省府主席后，有过一些进步行动，如他提出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就曾主张联合一切抗日进步力量，坚持抗战到底。当时日寇已占领杭州、金华等大中城市，庆元离铁路线最远，敌人不易进犯，黄曾想把庆元建设成为后方基地之一，故将最亲信的少将参谋长罗中天也派来当县长。而我党则利用黄、罗抗日进步的一面，派来一批地下党员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活动。施老说，我就是1938年春被省委书记刘英同志派来负责组建县委的。因此，在党内，我是中共庆元县特支书记，后来特支改县委，我是县委书记。在党外，我的公开身份则是民政科长兼兵役科长。我还到建德动员一批浙江大学的同学来庆工作。我们先后发展了一百多名党员、开始是建立特支，直属省委领导；后改为县委、则属处属特委领导。全县各区都建立了区委，部份乡、村建立了支部。还在县自卫队建立了特别支部，赵国琛是支部书记。并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庆元县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展了一大批“民先”队员，后来有相当部份队员转为党员。我们改革了抽丁抓丁制度，动员青年上抗日前线，应征者戴红花，敲锣打鼓欢送他们入伍；发动群众，开展“二五”减租；创办民众夜校和妇女识字班

等,还以县民政科出面办了乡镇事务员训练班,课程由我和县委其他同志讲授。在训练班中,发现和培养我们的积极分子,通过考验和考察,吸收其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那时各乡公所的乡长是不脱产的,由事务员掌实权。所以做好了事务员的工作,乡、镇的实权也就基本上控制在我们手里。在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积极分子的努力下,庆元的抗日救亡、减租减息等各项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由此也就无可避免地触及了统治阶层的利益,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惧和忌恨。他们上沟通国民党省党部,下挟罗中天,迫其向右转。在一次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的会议上,罗宣读了省保安处发来的一份密电,上面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和四十多个县委负责人的名单,说我是中共丽水县委委员。我当即抓住电文中的自相矛盾,据理反驳。我说,我是云和调来的,罗县长完全清楚,可以证明。如果说我是云和县委委员,还有点道理。我在云和怎么可能是丽水的县委委员呢?这完全是捏造!经我一驳,罗中天和在座的县党部头头都面面相觑,奈何不得。可是我的身份也已明显暴露。罗中天也越来越露出了假进步的投机嘴脸。罗提出要我辞职,我也不利继续在庆元工作,于1939年2月,交代好县委的工作,在罗派武装的“护送”下离庆。后来省委又派了曾涛同志来接任。

在庆元中学,施老说,那时我们办的艺友师范,就是后来庆元简易师范的前身,而庆元中学又是从简易师范更名过来的。那时办学可困难呀,校舍是借用孔庙,名是一个学校,实则只有一个班,四十来名学生。现在成了一个有一千多名学生的重点中学,今与昔比,真有天壤之别!当走到一间尚存雕梁彩栋的旧房时,施老仔细辨认后说,这是当年县民众教育馆的旧址、是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场所。我们有不少同志是以民教馆长或工作人员的身份作掩护,进行地下党活动的。如我走后的县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副秘书长曾涛,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民教馆长,他的爱人朱黎青是民教馆工作人员,原县委青年部长,现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陈麒章,也当过竹口区民教馆长和县民教馆长。施老还深情地约县委书记徐培金同志在旧址前合影留念。

在县良种场,施老指着丰收在即的稻田说,这是我们当年办农场

的地方。那时庆元蔬菜少而单调。我们外来者天天食山珍——笋干、香菇，开始几天还感到挺不错的，时间久了也觉乏味。于是我请来了浙江大学农学院的一位同学来这里办农场，引进了西红柿等许多新品种，对发展山区的蔬菜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施平同志应县委邀请，向县机关干部作报告。当县委书记徐培金向大家介绍，中共庆元县委的第一任书记，七十五岁高龄的施老，上午爬石龙山，参观当年地下党活动的旧址和市容，下午又兴致勃勃为我们作报告时，与会者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敬意和感激。

施老在报告中，回顾了当年在庆元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高度评价我县人民对革命斗争所作的贡献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同时还着重讲了如何重视人才，尊重人才，培养人才，加速庆元“四化”建设的问题。这位曾任过北京农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老同志。曾长期从事人才的培养工作，目前在探讨现行教育制度的改革。他认为庆元要振兴非靠人才不可。除了要有一定的具有大专水平的知识分子外，更要有一大批中等专业技术人才。建议县里尽一切可能创办一或数座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以适应山区建设的需要。例子生动，语言亲切，听了催人振奋。

晚上，施平、汪海粟等老同志出席了县领导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为振兴庆元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汪老曾主管过江苏省的计划、经济工作，在这方面很有路子。他说，江苏人口稠密，省里有过拒绝在外省的本省人回原籍。但常州市的劳动局却敞开大门，凡愿回常州的都欢迎，结果很多人都回来了，对常州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汪老建议我县可派人到江苏的一些市、县去参观考察，如需要与江苏的市、县挂钩，他愿当“月下老人”。施老说，要振兴庆元，首先必须对本县的人才和资源进行调查，摸清自己的家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发展规划。当县长李一深说，后年是中共庆元县委成立五十周年，届时请您参加纪念活动。施老表示一定来，并把曾涛等同志也请来，建议把解放后的历届县委书记都请来，

光明的抉择

——庆元县和平解放与国民党 庆元县民众自卫队的投诚经过

刘先标

编者按：关于庆元县和平解放的经过，本刊第二期《一唱雄鸡天下白》一文已作了报道。本文着重记述当时的混乱局势与军政人员的思想演变过程，它将能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当时庆元国民党当局是怎样走上和平解放的道路的。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2日，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天堑”之后，4月23日深夜十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国民党首都南京。省会杭州，形势万分紧急。当时的庆元县长陈国钧是在4月中旬到省城活动调离庆元事

出个“你为庆元做了些什么？还将再为庆元做些什么？”的题目，请大家讨论，共同把庆元建设好。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十一点多钟，陪同人员想到施老这一天已活动了十多个小时，担心他太累了。他笑笑说：“我一点不累，因为回到庆元我很兴奋。”

离别的早上，施老对送行的县领导千叮万嘱，依依道别，交托他们一定要把庆元建设好，把粟裕、叶飞同志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好。上车时间到了，但施老似乎还有说不完的话，在随行人员的数次催促下快快上车，并说：“再见，八八年时再来！”

来吧，在庆元战斗过、工作过的老同志，庆元人民欢迎你们重访故土，庆元人民以新的成绩迎接你们！

宜的，得逞后即匆匆回县，等候与接任县长干城办好移交，立即离去。一日忽接省府来电，告以“省府迁移，嗣后便宜行事，毋须请示”。形势发展之快，使陈国钧举止失措，一枕调职后的黄粱美梦化为乌有，未几国民党败兵经过庆元的消息又接踵而至，弄得人心惶惶，群众纷纷逃离城内。

5月11日，陈国钧在县府召开会议，组织竹口、八都、城镇军民接待站，招待过境的国民党败兵。城镇接待站由警察局长金永满任站长、镇长姚德生为总务股长、县参议会秘书柳五为交际股长、建设科长楼斌为宣慰股长，设干事若干人。同时派兵扼守球山、石龙山等城内各制高点，修筑工事，准备负隅顽抗。5月12日到处捉伏，百姓携妻带子，四处纷逃。陈国钧下令关闭城门，群众更为惊慌。不顾生命、爬城逃跑的人越来越多。不得已于10时开掉城门。各机关，学校都安排了住宿败兵人数，公教人员，学生也跟着疏散下乡，商店都关了门，城内、后田笼罩着一片凄凉恐怖的阴影。

12日下午3时左右接八都来电，原要经过城内的国民党败兵十一师已经淤上往政和方向溃去。晚上陈国钧利用原准备招待国民党军的酒肉，具柬邀请在城的军政要员宴会。席间情态各异，吴绶作了鼓动性的讲话，表示要忠于他的党国；郑可建、胡念由则神态自若，说说笑笑，只顾吃喝；姚化等文职人员，听说要打仗，思想紧张，不知适从；陈国钧显得忧心忡忡，平日酒量不小，却推身体欠安，滴酒未入，只顾吃菜，还不时去听收音机。宴后将多余酒肉、米、菜拨给自卫队作慰劳品。

5月13日晨，陈国钧叫刑警许祖水（诸暨人，陈之同乡）传刑警队长陈宝堂到他的办公室说：“快去叫一个可靠的人，马上出发。”陈宝堂找来陈国钧在浦江当县长任内带来的亲信朱瑾（现名朱来兴，浦江下方村人），两人各带木壳枪一支，陈国钧自背一只药箱，匆匆走经南门，往猫弄底方向窜去，途遇商人×××，陈即脱下中山装与他对换长衫穿上，扮成郎中先生向政和方向逃去。晚上无吃无喝，饥肠辘辘，在一个水碓里宿了一夜。第二天到政和县城被国民党败兵拦住。查问时，陈推说自己是医师，败兵见他不伦不类，打了他一记耳

光。陈宝堂见势难隐瞒，连忙拿出庆元刑警队的证件，说明陈国钧身份，并说庆元被共军占领，他们是逃跑出来的。败兵带他去见师长，答应带他们同走。陈宝堂、朱瑾不愿同去，分别时，陈国钧身无分文，还向陈宝堂借了些黄金作盘缠。

陈国钧走后，庆元县的军政大权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郑可建手里。

当时的庆元县民众自卫队，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设总队长一人（县长兼），副总队长一人，总队附一人，下设四个中队，一个突击队，一个军士队，共计官兵411人。上校副总队长郑可建，浙江东阳人，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工科，1946年任某部独立工兵团少校连长在鲁南和我军作战，兵败被俘，经教育释放回家，对人民解放军政策有一定认识，对当时形势发展较为清醒，1949年2月来庆元就任副总队长。陈国钧逃跑后，郑为控制力量，电令驻荷地的许天君率部进城，同时电令驻竹口的高贯武率部进城候命。当他给高贯武打电话时，不料接电的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郑可建大吃一惊，解放军要来是早在郑可建意料之中，但来得这样迅速，却在意料之外。当时他几乎摔了话筒，急转话题：“请参谋长接电”。接电的人自称参谋长，郑即告知自己是庆元县民众自卫队上校副总队长，说明要“率部投诚”。解放军即表示欢迎，命郑部继续负责城防，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所有设施的安全。

郑可建深知率部投诚，必须说服拥有实权的总队附吴绶，否则后果难以设想。总队附吴绶曾任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长、县政府会报秘书，清乡队副队长。1947年参与浙闽六县联防指挥所副指挥童烈在黄真、三济、四源剿共，杀害我地下党员和无辜群众多人，血债满身。当郑可建告诉他解放军已临县境，怎么办时？他曾妄图负隅顽抗，提出“打不能取胜再逃”的主张。后经郑可建分析战降利弊和再三说服，告以自己在鲁南战役被俘得到宽大的实况，同时表明自己已与解放军通过电话，愿意率部投诚的态度。吴绶在无可奈何之下，最后表示投诚。

5月13日郑可建向解放军通电表态后，驻守竹口的第四中队第二

分队少尉分队长叶万里(又名叶鹏)向解放军首先缴械投诚。解放军写了一封敦促自卫队投诚的信,叶万里漏夜送交郑可建,并回报了竹口缴械投诚情况、解放军实力和宽大政策等。因此更坚定了郑可建等的投诚决心。另一封信派班长王标送给驻黄真乡姚村的四中队一分队中尉分队长叶正浩。叶闻知竹口解放,立即偕同上尉中队长高贯武率队逃经龙泉孙坑、小梅、垵顺转回本县乔竹乡(今后广乡)听候动静(军管会成立后由乡长王继康派伙将该部枪弹挑来交缴)。14日上午驻守城内的第二中队上尉中队长殷宗浩突然撤去东门、南门岗哨,率队向济阳乡(今大济、杨楼乡)方向逃去,潜伏在大济附近山中,经派人劝说于当日下午4时回城。

郑可建,深知军心混乱,为了统一部属思想,曾在参议会楼上召开中队长和部份分队长会议。报告大军临境,分析战降利弊,要求统一思想。会上争论激烈,意见纷纭,外地军官多数主张硬打一仗,后拉队伍上山;本地军官则多数主张缴械投诚,保全身家。郑可建再三晓以利害,而意见始终统一不起来,气氛非常紧张。会后,有两个顽固的分队长一个班长竟扬言:“谁说投降就枪毙谁!”后来,郑可建、吴绂又约第一中队长胡辉,第二中队长殷宗浩、军士队副队长朱景元等到咏归桥做思想工作,路上边走边谈。郑可建分析了整个形势,指出“庆元自卫队士兵逃亡、厌战的现状,带兵逃则军需无法补给,弃兵独逃则散兵上山为匪,都是害人害己的事,打硬仗则区区四百人枪何异以卵碰石”。说得殷宗浩等默然无言,最后也表明了投诚的态度。随后就释放了关押在警察局的囚犯。

5月14日,郑可建在参议会楼上召集部份地方人士余梓贤、邱兆东、吴仁翁、吴如岗等会议,宣布向解放军投诚,要求大家组织起来,确保地方安全,为迎接解放军进城做好准备工作。后来余梓贤、邱兆东等组织群众,日夜巡逻,为保护地方做了有益工作。当日由吴绂执笔,郑可建签名,在县府门口张贴了缴械投诚的安民告示;撤去球山、石龙山上的部队,群众情绪基本稳定下来,秩序逐渐恢复。

5月15日选派殷宗浩、姚化、吴占年、周其才四人为党政军代表,持郑可建名片至新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解放军负责人接见

了他们，并向他们交代了政策。殷等连夜返城汇报情况。同时去新窑、竹口向解放军联系的还有由大济吴太烈组织起来的姚欢喜等三人，他们受到了解放军的赞扬。郑可建继续不断用电话要求解放军早日进城，防止变化。

经过联络，人民解放军决定5月17日下午进城。上午九时许郑可建主持在县府东厅召开组织迎接解放军进城的会议。吴绫在会上泣不成声地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今日不能报效党国，落得投降地步，实在感到痛心。”大家劝慰了一番。郑可建说事已至此，非区区小县可以挽回，解放军欢迎我们投诚，人民生命可以保全无虞。现在解放军就要进城，还是研究一下有关事宜，免得耽误时间。于是集中讨论。会上公推解放军进城前县政由郑可建负责；用自卫队印信行文（此时县印因陈国钧逃跑尚未查明下落）；公推县党部执行委员、县简师校长赖善卿为迎接解放军代表。下午赖善卿率领各界人士二十余人，手举红旗，出太平门沿路迎接解放军。代表们至拱瑞堂附近碰到国民党散兵十余人，身携武器，鼠窜而过。行不多远，接了解放军先头部队，回报了前面遇到国民党散兵情况。解放军说：“他们跑不了”就匆匆前进。再行至角门岭就接上了解放大军。解放军负责同志热情地接见了代表们，坐在凉亭板凳上详细询问了城内情况，并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同行进城。郑可建率领吴绫等官佐，政府人员在太平门外列队欢迎。城门内外和主要街道站满了迎接解放军的群众，欢迎声、拍掌声混成一片，死气沉沉的山城，顿时活跃起来。

解放军进城后，当即撤去自卫队岗哨，收缴枪支，在县府会议室举行了简短茶会。郑可建致欢迎词，解放军说了嘉勉的话，并交代了政策。接着派人书写墙头标语，在街头巷尾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动员退避乡村的人回城，各安其业。解放军本着革命优良传统，对群众秋毫无犯，每天在简师操场休整操练队伍，士农工商恢复旧业，社会秩序稳定正常。次日，解放军某部政委又召开了国民党军政人员会议，要大家各守岗位，安心工作，办好移交，处理善后事务，每人每日暂发大米3斤，以维生活。

当5月13日陈国钧出走后，刑警队员许汉水等曾携武器追至政和县界，因陈已随国军去，又返回淤上投宿乡长家中。诸暨同乡陈柏仁等也从城里逃到淤上，彼此相遇，茫然无所适从。恰好陈宝堂二人从政和归来，知道追随陈去，已成泡影。乃于5月17日派赵连富、许汉水回城探明情况，5月18日他们一行14人即带短枪7支，子弹若干发回城向解放军交缴。县警察局长金永满曾率武警逃往安溪，亦于18日回城投诚。两天后，除金永满、陈佩良等人留办移交外，其余经解放军发给证明，分批资遣回家。尔后，郑可建、殷宗浩、胡辉几个外县军官，搬出自卫队部，另行拨房居住，自起伙食，办理移交，等待遣散。县府主任秘书孙义安被群众押回寄监，办妥移交后释放回家。自卫队由总队干事吴鹤年清点枪支、弹药、登记造册，其他武器并由郑可建签署移交。其他单位的物资财产分别造具清册，一一交接。接着成立军管会，解放军调防，由乔根源部接管庆元。郑可建等军政人员除留用12人外于1949年7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分别资遣完毕。

从此，国民党在庆元的政权彻底消灭，人民当家作主。“你是灯塔”、“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庆祝解放的歌声响遍城乡。

書山有路勤為徑
學海無涯苦作舟

一九六六年 練金十一歲

书 法

回忆我在庆元的日子里

吴醒耶

本文作者吴醒耶先生，原任国民党浙江省训练团毕业生辅导室主任，于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调庆元任县长。现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抗日战争期间，我于1943年秋至1945年春约有一年半的日子在庆元任职。作为一县之长，也即是所谓“父母官”吧，总得做些关怀民瘼的事才对。在这种幼稚、天真的想法驱使下，就把兴学，禁赌和破除迷信这三件事作为自己任职期内的目标，以为这样就可把当时那个黑暗腐朽的社会改变过来，而除此之外，奉令行事罢了。以下，就是 I 尚能回忆到的一些片断：

兴 学

我在庆元的兴学计划，是全县各乡镇都要普遍成立一个中心小学，已成立的，则应进一步求其充实和完善。为筹集兴学经费，办法是：一、由我亲赴各乡召开乡民大会向殷户劝捐。为此，我尚记得在某个乡（乡名忘记了），召开乡民大会时，曾打过一个相当顽固吝啬的殷户手心；也曾在另一个乡责令一个绰号“雌老虎”，拒绝捐钱的女富户打扫所在村的全村街道，以煞煞她的“雌威”。现在看到《庆元文史》第五期中有一篇赖善卿的文章，曾说起“民国33年县长吴醒耶发动群众捐资兴学，一乡办一个中心学校，除将全县寺庙会产拨充学校经费外，还亲到各乡硬性摊派，大发淫威，三济乡乡长叶明斋不肯带头，就当场放下打屁股，结果只好服服贴贴地带头捐募了。”这些话一般是事实，但也不无略有出入或稍事夸张之处。比如说“打屁股”的事，现在，我却怎么也记不起打过什么人的屁股，可赖同志既已有名有姓的指出，那我也只好承认“大发淫威”了。同时，所说“将全县寺庙会产全部拨充办学经费”云云，也並不全属事实。这原是我